



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公元730年，唐代诗人孟浩然夜宿新安江边，写下了《宿建德江》。建德，建县于三国时期，取“建功立德”之义，今属杭州。历史上，建德隶属严州府——一个古老的、今天已不存在的行政区划。

这片土地也是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杨斌的家乡。作为历史学者，杨斌研究过古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、殷墟的海贝、葡萄牙人的龙涎香等，这次他将目光转向自己的家乡，以一本新作《江南以南：被湮没的严州府》，打捞起严州府数千年的历史。作者对家乡的回望情深意长，他笔下的“江南故事”为历史这块文明的拼图补上了重要的一块，亦温暖了每个游子的心。

打捞『江南以南』

本报记者 彭薇

一个游子的故乡回望

读书周刊：什么契机让您决定为家乡写一本书？

杨斌：我的家乡在建德市乾潭镇乾潭村，是浙西南山区的一个山村，位于杭州市的南部。小时候一睁开眼，门前就是高耸的乌龙山，也就是《水浒传》中宋江打方腊的地方。我13岁去县城上初中，一个月回家一次，从那时开始逐渐脱离了村里的生活。1990年9月，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，正式告别了家乡。家乡、家人和乡亲，就像长镜头一样，逐渐远去。

1998年9月，我离开北京到美国波士顿攻读博士学位，2004年毕业后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、澳门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工作。所以，我52年的人生岁月，在异乡已超过35年。

乾潭位于乌龙山下的小盆地，四面群山环绕，当年的人口不过数百，并没有什么出色的人物或事迹值得夸耀。哪怕在明清时代，建德县或者建德县所属的严州府山多、地少、人稀，在浙江不过是普通的府县。我之所以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家乡，有几个偶然的因素。

我从小听外婆、外公等长辈讲述家史，里面有许多移民、抱养和过继的故事，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，可能是因为人物复杂、情节繁多，总是记不住。等到我2005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后，便有意愿地将聊天内容作为家史记录下来。2017年夏天在澳门大学历史系任教时，我突然有了把家史扩展成家乡史的念头。即便我知道，严州府在1958年就撤销了，成为清代浙江下辖11个府中唯一消失的行政单位；我也知道，严州和建德文献稀少，其地位无法和历史上的杭州、绍兴等名郡望县相比。

一方面，家乡的研究难度大；另一方面，它没有名气，很难吸引读者。我思之再三，最后终于下了决心，便开始阅读严州的地方文献。所以，这本书的起因是家乡情结和学术探索两者的结合。

读书周刊：为何会将自家的家乡定位为“江南以南”地带？

杨斌：提到江南，人们头脑中会

涌现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，大众心目中的江南指的是平原水乡，以苏州和杭州为代表，所谓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。

从学术的角度，学者眼中的江南则是漫长的历史概念。它虽然泛指长江以南，但秦汉时期的江南和唐宋时期的江南，以及明清时期的江南，都有着细微或显著的差异。以距今最近的明清时期而言，明清的江南核心地区是指太湖流域，包括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，大致为镇江、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南京、嘉兴、湖州、杭州等八地，这是明清时期富甲天下的区域。严州位于杭州的西南面，它的地理和文化身份就属于江南以南。

处于浙西南山区的严州府，它的境遇比较尴尬。历史上，严州府和杭州府并立，因而严州不属于杭（州）嘉（兴）湖（州）所在的江南；同时，浙江是滨海省份，但严州属于内陆山区，境内是连绵起伏的山脉，方志中说“万山一窟”十分形象。严州以山林经济为主，其他行业均不发达，而山林经济因为体量有限，影响也不大。因此，从地理上看，严州虽然属于美国人类学者施坚雅归纳的东南（也就是闽浙），但从文化和经济上看，严州府与浙江沿海和福建省都是千差万别。

实际上，与严州地理、族群和文化上最接近的，还是新安江上游的徽州，因为起源于徽州的新安江向东从严州境内穿过，而后折向北成为钱塘江的上游。但严州地狭人稀，无法像徽商那样在江南如竹根般深入展开。

广义上的江南包括长三角的其他地区，如浙江、安徽等省和太湖流域毗邻的地区，包括宁波、绍兴、徽州等，严州也在其中。这些地区位于江南的南部，可以看作江南的边缘地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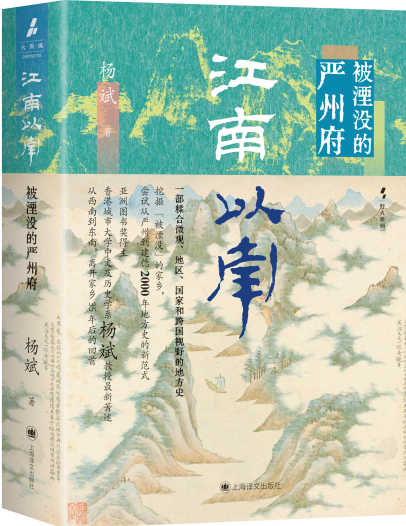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周刊：新书的副标题是“被湮没的严州府”，“被湮没”指向的是什么？

杨斌：“被湮没的严州府”有几重含义。第一是地理意义上的湮没。严州府的土地、村庄和城镇被水库淹没了。这是物理上的湮没，很直观。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建成，千岛湖淹没了严州府六县中的遂安、淳安大部，30万居民迁移；1969年富春江水库又淹没建德北部的一些村庄，5万多人外迁。这两次移民占当时严州府人口的



建德新安江彩虹桥

视觉中国供图



《江南以南：被湮没的严州府》
杨斌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近一半，最繁华的县城、文化核心区如今都沉入水底。

第二是行政上的湮没。严州府因为土地被淹、人口迁徙，导致行政编制被取消了。

第三是文化意义上的，当地小一半的人口迁居外地，导致村落、民俗、文献、记忆的消失。严州府就这样被遗忘了。

严州是个独特的存在

读书周刊：您在书中提到了严州独特的方言、建筑、民俗等，最能代表严州府文化的是什么？

杨斌：饮食和语言（方言）是地方文化最鲜明的成分，严州府也大致如此。以饮食而言，因为位于山区，严州府的饮食和浙西南的金华、衢州一样偏辣，这和杭嘉湖是大不一样的。今天，建德饮食的一个特色就是别具一格的豆腐包——以拌着红辣椒酱的新鲜豆腐为馅。

以方言而论，严州在全国范围内属于语言最复杂的区域之一。严州府身处“吴根越角”，又是东南水路的要道枢纽，所以受吴语、徽语等影响颇深。以建筑而言，严州的传统建筑属于徽派，也就是青砖、绿瓦、马头墙。严州府在行政上属于浙江省，但在文化上受徽州影响最深。

以我的理解，最能代表严州府文化的是其境内的一山一水。一山指乌龙山，它象征着严州文化中的“阳”——刚直不屈，有时不免执拗；一水指新安江，它象征着严州文化中的“阴”——柔和秀气，有时不免狭隘。

读书周刊：如果将严州府与它周边的杭州、金华、徽州等文化区域相比，您认为它最无法被替代的文化贡献在哪里？

杨斌：严州府的历史地位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。它位于江南的丘陵地带，是“江南以南”。所谓“万山一窟”，也就是七山二水分田的地形地貌，使得它与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截然不同。它又地处徽杭之间，新安江一水逶迤穿过了严州府的六县，连接了徽州和杭州。因为新安江、兰江、钱塘江、大运河贯通南北，严州又成为东南地区的交通枢纽，宋元以来还是海外诸国的贡道。这种“江南以南，徽杭之间”的特殊地理和文化是严州独特的历史贡献。

读书周刊：很多时候，我们从他身上照见自己。从跨国史的角度看待地方史，把一个个个人物放在王朝甚至世界的历史脉络中，阐述严州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以及中西交流中的特定角色。这也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。

杨斌：严州是浙西南山区的一个府，也是海外诸国前去临安、南京和北京朝贡的一个必经之处。我在书中通过一个个案例枚举了严州之于跨国的角色和意义，如在越南成神的南宋第二位杨太后，元代欧洲苦行僧鄂多立克在梅城三江口见到的鸬鹚捕鱼，令欧洲人着迷700年的中国鸬鹚之故事，马戛尔尼使团和琉球使团在建德江上的邂逅，严子陵钓台之图像在欧洲的传播，以及东南海上难民经过严州返国（琉球、日本和朝鲜等），等等。

这些跨国事件都展现了严州不仅仅是中国的严州，也是东亚和世界往来的交流之地。严州和整个中国一样，都在世界之中，并非孤立于世。

历史学者应为无声者发声

读书周刊：严州府留下了严子陵、范仲淹、陆游等名人的旅途印记，对哪位人物的研究让您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？

杨斌：严子陵、范仲淹、陆游等都是严州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。不过，在研究过程中有出人意料发现的不是这几位名人，而是宋末元初的谢翱。

谢翱（1249—1295）是福建人。他曾考进士未中。1276年，文天祥开府延平，谢翱率乡兵数百人投靠他，任谘议参军（谋略官）。文天祥兵败后，谢翱避地浙东，在建德定居。1290年，谢翱登严子陵钓台，设文天祥牌位于荒亭隅，失声大哭。他的哭，是痛恨南宋覆亡、胡虏践踏中原，这也赋予严子陵钓台忠君死国“忠烈”的文化意义，激励了以后明末清初的一大批遗民。

我在研究谢翱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条非常珍贵的史料，找到了严州经济史的一条主线。谢翱的朋友邓牧在给谢翱写的传记中说：谢翱在建德定居，当了教书先生，还娶了建德媳妇，而后发现谢翱靠在严州砍柴运往杭州去卖而发了财，之后云游各地。我之前大致知道，柴炭行业是明清时代严州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行业。可是它从何时开始，无文献可考证。从谢翱的这条史料可以看出，依托新安江的山林经济至少从南宋就开始了。临安这个参差十万人家的繁华都市，其能源的来源便是严州。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，解开了隐藏在我心底许久的一个疑问。

读书周刊：您在书中还记录了寡妇汪氏、九姓渔民、集资修桥铺路的众多村民，以及自己的外公、堂奶奶等无名人物。为何会聚焦小人物的故事？

杨斌：我们的历史，往往聚焦于帝王将相、军国大事。秦皇汉武时代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，大众对他们的兴趣依然高涨。哪怕翻看近几年出版的历史类图书，这类书还是占了很大比例，吸引了大量的读者。

可是，大多数读者没有认识到，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并非秦皇汉武，而是被秦始皇征去修长城的“万喜良”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，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自己的足迹、发出自己的声音。正如我的同行所说，历史学者要多关注普通人，多关注日常生活，多写小人物。

我记得一两年前，清代袁枚的一首诗在网上突然火了。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，这首诗写的是小小的苔花，它在墙角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绽放。这首诗引起大家的共鸣，就在于苔花的隐喻：处在社会边缘地带的小人物也有春天，也有灿烂。正因此，我在书中写了不少小人物。我坚信，历史应该是民主的、公正的，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，无论男女，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，历史学家应该为无声者发声，为无言者留言，为无像者画像，为无迹者寻迹。

读书周刊：除了文献，口述历史是重建地方记忆的关键所在。在走访过程中，您遇到的最令您动容的讲述者是谁？

杨斌：我想谈一谈家乡的高雷锋叔叔。他是村里的文化名人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身材瘦削，为人乐观风趣，善于讲故事。

我的老家乾潭镇当年的商业中心，就在乌龙山北麓的子胥溪北岸，子胥溪向东十几里就流入了建德江。1969年，富春江水库建成，建德江水位抬高了很多，乾潭的商业中心也就是码头附近的商铺或被淹没，或改成稻田，无迹可寻。我在写这本书时就想，要是有人能把当年的商铺画出来就好了。我立刻想到高叔叔，于是找到了他。

非常巧，高叔叔多年前在镇里编写镇志时曾画了一幅老街图，可惜镇志并未收录，老街图也不知去向。我鼓起勇气询问高叔叔能否重新绘制一幅，因为他已近古稀之年，双眼高度近视，其中一只近乎失明，平时读书看报，眼睛几乎要贴到纸上。他一口答应下来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重新绘制了一幅1968年的乾潭地图，这幅彩图在我手上保管了好几年，最终收录于这本书中。遗憾的是，这幅图完成后不久，高叔叔就中风瘫痪了。这本书也是对他以及许多心系家乡的乡亲的回报。

读书周刊：创作过程中，最让您自豪的是什么？

杨斌：这次，我尝试了地方史写作的新模式，就是要写不一样的严州历史，让大家难以忘记。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史料缺乏。几年来，在议题的选择与全书章节结构上，我斟酌良久，颇费了一番苦心。总的来说，全书还是以时间为经，议题为纬，编织出各个时代中严州历史文化的特色。

在议题的选择上，我兼取了宏观、中观、微观的角度，努力突出趣味性，选择了风景、建筑（桥）、特定的历史时刻、水路、神灵、村庄、人物（精英与底层兼备）、家族以及性别等论题，尽量呈现出一个多维的严州。我在广州和深圳开讲座的时候，一些读者告诉我，这本书很有趣。这让我为之自豪。

历史叙事是被忘却的纪念

读书周刊：您说，历史学者不过是用竹篮在井中努力打捞明月，唯恐它遗

失，可“竹篮入水之际，便是明月破碎之时”。为何会有这样的感慨？

杨斌：历史的遗忘，以及历史学家对遗忘无力的挽救，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内在缺陷，而且是无法克服的缺陷。

不妨举两个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或事迹来说明历史学的这种无力感。一个是西西弗斯，他竭尽全力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，而到达山顶后巨石又滚回山下，如此反复，永无止境。在西方文化中，“西西弗斯式”用来形容“永无尽头而又徒劳无功的任务”。用西西弗斯推巨石来形容历史学追求真实、历史学家重构事实的过程，或许有些悲观。

另外一个例子是阿喀琉斯之踵。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，参与了特洛伊战争，被称为“希腊第一勇士”。阿喀琉斯幼年时被母亲倒浸在冥河水中浸泡，因而全身刀枪不入，但是，他母亲抓住的脚踝没有沾水而成为日后的弱点，最终在特洛伊战争中，他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以毒箭射中脚踝身亡。

历史学也有阿喀琉斯之踵，我体会三点。第一，时间是单向不可逆的，每件事发生了之后就不再重复，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因此，历史无法总结规律，或者说，历史学没有规律。第二，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，无论大小，无论崇高或微不足道，它留下的“足迹”，也就是历史学所谓的材料，都是残缺的、不完全的、零碎的，甚至可能零碎到“无”的地步。再高明的历史学家，碰到材料稀缺的时候总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叹。第三，历史学者本身就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，他们自己囿于身份（国籍、族群、性别、阶级等）、立场、文化、语言、训练、视野等的束缚，不可能完全“客观”地研究历史。

当然，我并不是单方面地否定历史学的价值和历史学者的努力。作为一个历史学者，我以此自豪，为之骄傲。事实上，历史学者的耀眼之处，和科学家一样——后者追求真理，无限接近真理却可能永远无法达到；前者无限接近真实，却永远不能抵达。

所以说，遗忘就是沉没，湮没即是忘却。被湮没的严州府便是历史的具体而微者。历史学家的努力，历史的叙事，究其本质，不过是被忘却的纪念罢了。

读书周刊：正如您所说，家乡是难以遗忘的，但是被遗忘的才是家乡。

杨斌：从个人的成长和情感而言，这本书是一个中年游子对家乡的记忆与记录。可是，我记忆中的家乡、风景、人物、事件等，其实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。家乡这35年的变化，于我是陌生的。我回到村里时，60岁以下的乡亲基本不认识我；而60岁以上的人，我也只能通过他们些许熟悉的面貌推测一下他们是谁。

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场面。它让我想到唐代贺知章的诗句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其实，一辈子生长在出生地的人是没有家乡的，游子才有家乡。可游子的家乡，又是停留在记忆中的家乡，它与现实中的家乡是有违和感的。就这一点而言，家乡永远存在于脑海与心底，难以遗忘，但是，现实无时无刻不提醒游子——家乡早已逝去，人们逐渐将其遗忘，家乡逐渐成为故乡。

严州的湮没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作为历史学者，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书写家人、家乡，书写湮没，书写遗忘。



明代钱穀画的七里滩（严陵滩）